



萧友梅： 改变中国音乐发展轨迹的广东人

文 | 邱意浓

DOI:10.19417/j.cnki.tzgj.2022.05.012

百多年前，随着门户的洞开，中国迎来了千古未有之变局，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纷纷涌入，中国近代音乐也在借鉴西方艺术风格的基础上，开始了新的探索。一位名叫萧友梅的人，早在年少时踏上前往东瀛航船的那一刻起，就决心背负起振兴国乐的使命，为中国音乐的发展奉献终生。

之前的中国音乐教育，大部分还停留在所谓的“学堂乐歌”上，五四运动开启了一场新的文化革新，自此，中国现代专业音乐文化开始全面建立起来，出现了最早的一批专业音乐教育机构，而被誉为“中国现代音乐之父”的萧友梅，正是这一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创办了中国第一所高等音乐院校，他是民国国歌《卿云歌》的谱曲者，他组建了中国第一支管弦乐队，他是音乐学研究领域获德国大学博士学位的中国第一人……

【求学生涯】

1884年1月7日，萧友梅生于广东香山县石岐镇（今属中山市），他原名乃学，字思鹤，别号雪朋，这“学”“鹤”“雪”三字，分别对应“进取”“贤能”与“高洁”之意，恰好概括了他的一生。

萧友梅的父亲萧煜增，原是前清的秀才，

后以塾师为生。1889年，萧友梅5岁时随父亲移居澳门，入倾向新学的儒生陈子褒所设的学校——“灌根草堂”学习。在那里，萧友梅接受传统的“四书”和算术教育，同时学习英文和日文，从小就打下了较好的国学和外文基础。

当时，隔壁住着一位葡萄牙神父，他既是传教士，又是音乐家，时常用风琴弹奏宗教音乐，这深深吸引了少年萧友梅。某日，他在庭院隔墙欣赏时，不禁随着风琴的音乐哼唱，神父发现后把他叫到家来。萧友梅初见乐器雀跃不已，他后来曾回忆说：当时自己对风琴“羡慕不已，然未有机会学习也”。音乐理论家廖辅叔这样评述：“萧家本来就是书香人家，加上灌根草堂的教育，萧友梅从小就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文史知识。他提交给莱比锡大学的博士论文之所以能够引经据典，左右逢源，是与早年所受的教育分不开的。”

1892年，孙中山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来到澳门行医，与萧家比邻而居，由于都是广东香山同乡，因此两家过从甚密。那年孙中山已26岁，时常来往港澳，与杨鹤龄、陈少白、尤列结成小团体，被外人称为“四大寇”，经常大胆议政。萧友梅耳濡目染，受孙中山民主思想影响很深。

萧友梅15岁时，考取了广州的一所新式学

堂——时敏学堂，所学课程，除中、英、史、地、算术外，还有图画、唱歌、体操等课程，门门成绩优异。次年，八国联军侵华，激发了新学堂学子们强烈的爱国热情，都希望出国去寻求救国救民的方法。1901年，萧友梅作为时敏学堂的首届毕业生，在校长邓家仁的带领下，东渡日本，自费考取了东京高等音乐学校选修钢琴和声乐，正式圆了他与音乐结缘的梦。

对于自费生来说，经济是个大难关。为了维持生活费用，萧友梅以纯熟的日语口语，为来自广东的教育旅行团及其他留日学生担任日文翻译赚钱维生，且在余款中为自己购置了一台钢琴。

1905年，萧友梅被选为留日学生会会长，其时，他在东京和孙中山重逢，内心十分欢喜。当时的孙中山正组织“中国同盟会”，萧友梅很快加入其中，成为会员。不久，萧友梅搬到革命党人廖仲恺寓所的楼上居住，以学习音乐的留学生身份，掩护革命活动，分散日本警察及清廷的注意。他们的住所成为了秘密集会的地点，每逢举行会议，萧友梅总是带着廖仲恺与何香凝夫妇的孩子在屋外玩耍，实际上是在给开会的人放哨，一有动静可立即通知众人。

1906年，萧友梅考取广东省官费留学生资格，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文科攻读教育学，并继续在音乐学校学习钢琴。同年12月，同盟会准备在江西萍乡，湖南浏阳、醴陵策划起义事宜，因风声走漏，清政府知会日本派出密探加紧缉捕孙中山。此时萧友梅已搬到东京郊外大九村的乐庐居住，遂将孙中山密藏在他的卧室很长一段时间，每天三餐与起居全由萧友梅照料。萧另外负责与廖仲恺等人的联络工作，直到次年3月孙中山安全撤至越南河内为止。孙中山对萧友梅的胆识与为人深为赞赏。

【厚积厚发】

1909年夏，萧友梅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回国。翌年，他参加清廷在北京保和殿举行的留学生殿试。学部发给他的证书，称萧友梅“留学生毕业考试取得甲等，奉旨赏给文科举人”，被清廷学部任命为“视察官”。

不久后，武昌起义枪声响起，辛亥革命爆发，大清王朝轰然倒塌，孙中山就任中华民

国临时大总统，萧友梅任“总统府秘书”，他从北京赶往南京，开始新的人生。可惜好景不长，同年4月1日，革命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盗取，南京政府被迫解散。

解散前，孙中山询问各位成员的志向，萧友梅表示，还是愿意继续学习音乐，并且想去德国深造，因为日本现代音乐教育的来源地就是德国。孙中山当即批准了萧友梅的请求，还将此事交由教育总长蔡元培办理。因经费问题，萧友梅等待数月，终于在10月收到好友蔡元培的来电：已筹得款项，即可放洋。

1913年，萧友梅开始进入由门德尔松一手创办的德国莱比锡音乐学院，攻读音乐理论和作曲；同时又在莱比锡国立大学攻读哲学与教育学。在这些高等学府里，不仅有乐坛泰斗任教，还有举世闻名的合唱团。其时，萧友梅已步入中年，他倍感光阴宝贵，把别的同学上舞厅、泡咖啡馆的时间都用在在了学习上，同时他生活非常节俭，曾在一所修道院住过一段时期，专心钻研学问。

1916年夏，萧友梅用德文写出《十七世纪以前中国古代乐器史的研究》论文，以“CHOPIN”为别名（以示对波兰音乐家肖邦的崇敬），将论文提交给莱比锡大学哲学系。萧友梅在论文的结尾部分指出，他为清廷未能促使音乐院成立感到惋惜，因而“我个人的愿望是除了推广一般科学技术外，在中国还更应注重音乐，特别是积极培养系统理论与作曲人才”。由此可见，萧友梅在德国学到的不仅是钢琴演奏技术和作曲理论，还有对音乐学术态度和对音乐教育事业的信念。不久后，萧友梅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莱比锡音乐学院授予的结业证书上，对他的评语是：勤奋好学，品行、才能与成绩三项均佳，总评：道德上“无懈可击”，他也成为了中国首位音乐博士。

此时正值一战时期，海上交通已断，萧友梅一时无法回国，他便于这年10月，转入柏林大学，继续选修哲学、教育学、伦理学、儿童心理学、音乐、美学等课程。

由于战事关系，当时德国都市食物短缺。某日，一群外国来的留学生在用餐时谈起自己国家的情形，萧友梅自称是中国南北朝时代梁朝萧统皇帝的后裔，引来众人注目，于是后来大家都叫他“萧王子”，早餐时房东甚至



萧友梅

为他准备了一块当时十分珍贵的牛油。后来萧友梅住在波兰波森的农村，他靠种植马铃薯解决缺粮问题，并且在小学里教钢琴和法语赚钱维生，与当地农民相处融洽。由于生活贫困，萧友梅身体虚弱，曾因营养不良住院治疗，就此落下了病根。

除了忍受身体上的病痛，萧友梅也在苦苦思索祖国音乐教育的未来。“五四”以前，中国传统的音乐教育只限在文人的自娱性音乐方面，弹琴等音乐活动只是作为修身养性的一种手段。从事表演的活动，是由社会底层的“戏子”们担任的，这些活动与“国民音乐教育”并不是一回事。

那时音乐的整体地位低，质量也不够高，音乐专业不受重视，在高等学校里不过是附庸，有的与美术合在一起称为图音系，有的与体育合在一起称为音体系，有的更是大杂烩称为“图工操练”。萧友梅认为中国音乐无论民歌、民间器乐曲或者戏曲，多建立在五声音阶调式基础上，音调缺少雄壮刚强的气势。他所作的曲子中，大部分都用七声大调音阶，并且极为注重曲调的高昂，以表民族气节。

等到交通恢复，他带着这些想法，马不停蹄地回到了祖国。

【为《卿云歌》谱曲】

以萧友梅渊博的学识和早年的革命经历

及同国内政界高层人士的关系，要谋得一个薪位高的职务并不困难，但他毅然选择了开创音乐教育事业的艰苦道路。

1920年3月，萧友梅回到当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平。碰巧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从欧美考察教育归来，他非常欣赏萧友梅的为人和才能，萧友梅也很赞同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于是萧应邀担任北大中国文学系音乐讲师兼该校音乐研究会导师。在北大，萧友梅的课深受广大师生的欢迎，每当他开讲，“听者几近千人，极北大校园一时之盛”。

由于蔡元培的发起与倡导，北大率先成立了音乐研究会，萧友梅加入了蔡元培任会长的“北大音乐研究会”，并在该研究会编辑出版的刊物《音乐杂志》上发表多篇音乐启蒙性文章。这些成果无疑是在中国发展音乐的好兆头。萧友梅曾分析中国音乐发展缓慢的原因，觉得要使中国现代音乐发扬光大，首先必须立足于办好音乐教育，培养出中国自己的音乐人才。

此外，他还想在中国创立曾在德国看见过的合唱团，把音乐作为文娱活动以一种更为亲民的方式普及，才能引起大众对音乐的兴趣。

1922年冬，萧友梅召集清末海关总税务司署管乐团的16名成员，成立“国立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管弦乐团”，由他担任指挥，组织成员每个礼拜到家里排练。

乐团的第一场演出安排在北大。在当时的中国组织管弦乐队，仿佛在美国街头唱二人转，对当时思想不算开放的人来说，多少是有点文化冲击的。听闻演出的消息，男女老少倍感新奇，都好奇地往北大第三院的大礼堂走去。乐队队员一上场，人们就交头接耳议论开了——他们手里拿的是提琴、洋号，身上穿的却是长袍马褂，样子滑稽又古怪。

萧友梅带领乐团气定神闲地完成了表演，表演结束的那一刻，获得了满堂喝彩。这支乐队并不是昙花一现，从1922年底到1927年将近5年的时间，带来过40余次的精彩演出，演奏了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等音乐大师的作品，为北京群众介绍了不少西方音乐艺术知识，掀起了一阵社会新风潮。

有一回，徐志摩在北京大学给学生们讲述英国诗人济慈的《夜莺歌》时说，“没有听过夜莺的歌唱是很难了解，北京有没有夜莺，

我不知道”。他提出一个补救办法，就是建议学生们去听萧友梅先生指挥演出的贝多芬第六（田园）交响乐，“那里面有夜莺的歌声，好吧，我们只要能同意听音乐——自然和人为的——有时候可以使我们听出神”。可见管弦乐队在那时的势头之盛。

那几年，大概是萧友梅最愉悦轻松的几年，除了办管弦乐队之外，他还开始源源不断地创作。

1919年12月4日，北洋政府设立“国歌研究会”，办理审定新国歌事宜。翌年，章太炎提议采用《尚书大传·虞夏传》中的《卿云歌》作为国歌，歌词仅四句：“卿云烂兮，糺缙缙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象征中国国运昌盛。萧友梅从德国回国来到北京不及一周，就被聘为国歌研究会会员，并获委任创作国歌。他用西洋作曲的技巧谱成一首E大调、曲调庄严流畅的曲子。后经北洋政府国务会议通过，并于1921年7月正式颁布定为国歌。但这首《卿云歌》由于歌词过于深奥古朴，后被废止（后来成为复旦大学的老校歌），萧友梅却因谱写国歌名气大增，北大音乐研究会的声望也随之提高，吸引了众多青年学子前来习乐。

1920年9月，萧友梅与杨仲子共同创办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内设音乐、体育专修科，萧友梅兼任科主任。杨仲子早年留法攻读化学，副修音乐，后在日内瓦音乐学院学习音乐长达十年之久，与瑞士女子结婚，1920年回国成为萧友梅得力助手。

1922年8月，经萧友梅提议，北大音乐研究会改组为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以养成乐学人才为宗旨，一面传习西洋音乐，一面保存中国古乐，发扬而光大之”。传习所由校长蔡元培兼任所长，萧友梅做教务主任负责实际工作。

但北洋军阀的教育部以“有伤社会风化”“浪费国家钱财”为由，下令停办北京所有国立院校的音乐系科。萧友梅苦心经营了5年的北大音乐传习所也被迫解散。萧友梅愤而辞职，随蔡元培南下寻求发展。

【创建上海国立音乐学院】

萧友梅没想过放弃，也没想过在身世浮沉的时代明哲保身，就算有一丝希望，他都会

奋力争取。

1927年10月1日，蔡元培就任南京政府大学院院长，经蔡元培力争，政府终于通过了萧友梅创办国立音乐院的计划。不过，计划虽然通过，之前说定的6万元经费，财政部却要等“战争结束后即筹划拨给”。说是“战争结束”，实际上就是不会再给了。这时，多亏好友杨杏佛出面为他力争，萧友梅才拿到3000元不到的“开办费”。

拿着这笔少得可怜的钱，他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所专业高等音乐学府——国立音乐院，它就是今天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

几尺小弄堂内，大的房间全都用作教室，校长室就在阳台上，在栏杆上面装上一排玻璃，挡风遮雨。

萧友梅同大家挤住在一起，每天穿着一套普通的旧西装上下班。他既没有专用汽车，也没有校长专用黄包车，外出办事，近处就靠两条腿，稍远就乘电车。学校甚至连员工都请不起，门房、打铃、传达、清洁……等等杂务都由一名“校工”兼任——那就是萧友梅。

办学时，萧友梅已年近五十，身体状况堪忧，他从早到晚像台连轴转的机器，没空停歇。而上海国立音专，就是他苦心经营的一个家。1927年下旬，经考试筛选，学校先录取了19名学生，继而又从外地赶来的，后补录学生4名。

条件虽苦，但萧友梅依然心怀希望。他在11月27日的开学典礼上鼓励学生：“伦敦皇家音乐院1823年成立时，只有20个学生，80年后增加到500人以上。大家共同努力，10年后



国立音乐院，1929年9月改名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

就可以有500个同学了……这是对音乐院的唯一希望。”萧友梅曾设想以后每年招收50名学生，10年500人，这也是萧友梅对中国音乐教育事业前景的期待。

国立音专这张蓝图，萧友梅很多年前就开始筹划，其中渗透了许多得来不易的经验。它的许多办学特点，至今值得我们借鉴。

首先是师资力量。1927年，中国正处于被列强蚕食的水深火热之中，萧友梅只是一介钱袋空空的穷教师，要是想请到在国际范围内有声誉的教师，怕是难上加难。可萧友梅偏偏就是凭着一份求贤若渴的精神，聘请到大量水平极高甚至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音乐教育家。

那时，萧友梅初到上海，并不了解当时当地的音乐状况。当他首次听到有东方第一美誉的工部局交响乐团的演奏后，写下了一段感受：“当战云弥漫全国，人民感受的痛苦无处可诉的时候，真教人千万想不到这个孜孜为利，俗气不堪的上海租界地方，居然可以找到一个安慰灵魂的圣乐与一个极难得的领略艺术的机会，这不是好看的衣饰，好吃的饭菜，却是上海公共租界的市政府所主办的交响乐音乐会。现在我敢对人说‘上海市政府的管弦乐团，是上海唯一的宝贝’。”该乐团的成员，均来自于欧美各国一流音乐学院，并有相当的教学与演奏经验。萧友梅争取到乐团的首席小提琴富华（意大利人），大提琴首席余甫磋夫（俄国人）等名家多人来院任教，大大提高了学院的教学水平。

1929年，极富盛名的钢琴大师、俄国人查哈罗夫旅居上海，这是个难得的好机会。萧友梅初次慕名登门，请他到音乐院任教，竟遭冷拒：“中国学生如同刚学步的婴儿，哪能用得着我去为他们上课呢？”萧友梅三顾茅庐诚恳邀请，最后许出优厚条件，答应给他像校长待遇级别的400元月薪，当时音乐员教师薪俸为200元，最高也不过280元，另外还同意他只教7名学生，而其他钢琴教师每人至少教授12名学生。最终，查哈罗夫被他的诚心打动，改变了当初的傲慢态度，忘我地投入到教学中。

国立音专在1927至1937十年间，聘请教师总数曾达41人，其中外籍教师28人，中国教师13人。这样一种集中国内外一流师资队伍进行办学的思路和模式，为萧友梅专业音乐教育

事业的成功提供了最根本的保证。

其次，萧友梅坚持用蔡元培提倡的“美育”教育学生。

萧友梅对学生的爱护是众所周知的，他从不以“钱财”作为衡量学生的标准。萧先生曾感叹地说：“一个学生在音专上了几年学，领到一张证书，只是添了一份嫁妆。”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向全国普及招生，萧友梅特意向各省教育厅发函，让各省选送一些学生来音专学习，毕业后再回到原地，实行定向培训。这样一来，来自边远省份的孩子也能受到正规的音乐教育了，他们学成回乡，等于在全国遍播了音乐的种子。广西的陈传熙、山东的李士钊等均因此机会入校。

萧友梅尊重每一个前来报考的学生，对于千里马来说，无疑是最好的伯乐。1928年，冼星海由北平来上海考入国立音乐院，见他家境贫寒，萧友梅便让他在音乐传习所里管理音乐书籍和抄写乐谱，用工作所得补贴他学习生活费用。国立音乐院在上海成立后，萧友梅让冼星海、熊乐忱等原北大音乐传习所和北京艺专的学生免试入学，并安排冼星海以半工半读方式维持学习与生活，还曾亲自陪冼星海到上海工部局乐队报考黑管演奏员，可惜未被录用。

同年，丁善德以自学的一点琵琶知识从昆山前来报考，萧友梅慧眼识英才，将其招入学校悉心培养，日后果成大器。

第三，萧友梅在学习西乐的同时兼顾对国乐的培养及发展。

无论在北京或国立上海音专时期，萧友梅始终规定学生必须要学习一种民族乐器，而声乐学生期末考试的曲目中，一定要有国语独唱歌曲。古文与诗词更是各科学生必修课程，足见他对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视。他写的一本重要著作《普通乐学》，其特点是将中国古代乐制与西欧学制详尽地叙述分析与比较。

十余年间，学校培养了一批日后赫赫有名的音乐家，理论作曲有贺绿汀、陈田鹤、江定仙、刘雪庵；钢琴有李翠贞、李献敏、丁善德；声乐有喻宜萱、周小燕、斯义桂等人，多为我国近现代音乐界支柱式的人物。

然而，辉煌的成绩背后，也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心酸。因为贫穷，国立音专自办学以来经历9次搬迁，如此高的频率空前绝后。

萧友梅在1937年12月18日补行的开学典礼上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搬家是音专的家常便饭。”学校资金不够运转，就不能给予学生低廉学费。他一边想体恤学生，一边又不得不抬高学杂费。这样一来，个人经济利益和校方全局发展往往很难取得一致，引发了部分学生的不满。

其实萧友梅是位清廉的老师，曾有学生回忆：“有一年底，学校也像别的大学一样，有了一点结余。别的大学都用那笔钱买了汽车，萧友梅考虑到学校还缺少一台开音乐会用的三角琴，于是把它用到节骨眼上。不久，一台崭新的伊巴赫牌三角琴从德国运到了上海。”

萧友梅为人严肃，不苟言笑，事业心极重，常公而忘私，无暇成家，在他的传记里，甚至找不到一段风花雪月的爱情故事。朋友问起这个问题，他总是淡淡地说：“我已经同音乐结婚了。”直到1932年48时，经周淑安教授（声乐系主任）介绍，萧友梅才与沪江大学毕业的戚粹真小姐在杭州结婚，名画家林风眠担任证婚，婚后育有子女各一。

在莫干山的那些年，萧友梅依然惦念家国大事。“九一八”事变后，萧友梅写下《从军歌》，这是我国第一批以救亡为题材的爱国歌曲之一。早年就患有肺结核病的他，因长期积劳成疾，结核菌侵入肾脏，引起肾出血，医治无效，于1940年12月31日逝世于上海体仁医院，享年56岁。

萧友梅离开的那一天，仍不忘叮嘱前来探病的人回学校时，记得把钢琴课室朝外的门缝用硬纸条塞紧，以防吹进冷风，冻坏学生的手指。

【结语】

北京，饽饽房8号是萧友梅的故居。这座深藏于闹市之中的四合院，是萧先生早年买下的。他和父母、姐姐、弟弟等10余人都住在这里。

冬天，萧友梅常穿件厚棉长袍，外罩布衣衫，戴顶毛线帽，围长毛围脖，端坐在大书桌前写讲义、编书、作曲。一般是晚上9点以后工作至深夜2点钟。

萧友梅每天都要练琴2个多小时，还教授其妹妹、侄女等学习，并不时将新作的歌曲拿给她们试唱。音乐，不仅是他的工作，也是他

的生活态度，是他近乎偏执的信仰。每到周末和假日，萧友梅即邀请从各国留学回来的教授和同事们来家聚会，吟诗诵词，唱歌弹琴，赵元任、李四光、张奚若、黎锦熙、林风眠等都是常客。

如今，上海音乐学院校园里，有一座萧友梅的半身铜像，它出自美术家刘开渠先生之手，据说这是中国第一座音乐家的雕像。周围风景优美，绿树围绕。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萧友梅在北京寓所的琴室里，除了他崇敬的贝多芬、肖邦、巴赫、孙中山及父亲的相片外，还挂有一副对联：“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音乐殉道者萧友梅，此生鞠躬尽瘁，无愧于心。📷

（作者系文史学者）

书屋

2022年4期目录

书屋讲坛 学界新论	数字时代中西文化交流前景 从整体上认识经济学 认识中国：“社会调查”，抑或“社区研究”	黄维樑 陈彩虹 何钧力 陈心想 王金华 夏剑钦 胡喜云 鲁建文 徐凡 王澄霞 邢哲夫 刘金祥 杨璐嘉 陈丽 韩秀 徐宇杰 周晓波 立翁 郭丹曦 秦燕春 李怀宇 潘建伟 惠联芳 吴敬玲 刘道玉 乔惠泉 刘烁伟 沈栖 杨淑尧 周百义 姚前 闻中 李璇 米文文
红色记忆 人物春秋	吕振羽“回湘开荒”之旅 清末管学大臣、京师大学堂创办人张百熙 顾颉刚与国立编译馆 徐悲鸿在印度 “大地之子”陈国达与地洼说 彭丽华 一枕潇湘圆月在 大地上的尺度 对冬奥会的人文解读 一任流年似水东 中国传统法律的精义 历史小说的魂魄 中国美术史的方向	
书屋品茗	“苕竹县”源流 《水浒传》的散漫与精彩 一声蝉鸣两处伤 人间夜色还如许	
域外传真	谭延闿日记中的江孔殷（中） 徐志摩与民国旧诗人的往来 郁达夫题画诗与刘海粟的画中乾坤	
说长论短	黄维樑散论 读书的苦与乐 活法与活着 另一个幕末 清代“请觐”礼仪的变迁 彭燕郊的伏诗一束	
史海钩沉	《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纲要》序 《自主管理身份》序 《父亲与女儿的哲学对话录》序言 《倩女离魂》里的女性困境 隐性对立下生命“物性”的回归	
灯下随笔		
天下好书		
来稿摘登		

邮发代号：42-150 月刊 每月6日出版 定价：10.00元
地址：长沙市韶山北路443号《书屋》杂志 邮编：410007
电话：0731-85486812 0731-85791300
邮箱：1245297948@qq.com